

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 文献和资料选编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下 册

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代文学教研组编

* 供校内教学使用 *

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

文献和资料选编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下 册

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代文学教研组编

1974.10.

目 录

(四)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人民日报》编辑部345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人民日报》社论347

论所谓“揭露阴暗面”的理论和创作.....姚文元354

附：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

几个比喻和联想

——答《电影的锣鼓》.....夏 衍 388

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田 汉395

电影的锣鼓.....钟惦斐398

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403

本报内部消息（续编）.....刘宾雁434

草木篇.....流沙河459

(五)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毛泽东 641

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63

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471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485
评“三家村”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姚文元 508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姚文元 541
附：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	
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十条”）	585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节录）	601
海瑞罢官	吴晗 604
燕山夜话（节录）	邓拓 647

（六）

评晋剧《三上桃峰》	初澜 653
《三上桃峰》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	辛文彤 663
附：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	
三上桃峰	674
三下桃园（节录）	712
一匹马	唐广益 王仁厚 716
最大的荣誉	722
《三下桑园赎马记》编者按	724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 资产阶级方向

《人民日报》编辑部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

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他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 方向应当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象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

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

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基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

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

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

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

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论所谓“揭露阴暗面” 的理论和创作

姚文元

前一个时期，从刘宾雁的特写开始，在我们文学界逐渐滋长着一种“揭露阴暗面”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站在敌视社会主义立场上提出问题来的，它打着所谓“干预生活”的旗号，好象社会主义社会同他们是对立的，他们要从外面来“干预”一下。他们险恶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阴暗面，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揭露这些阴暗面，只有这样才能干预生活！”“歌功颂德就是粉饰生活！”右派分子则更狂妄地叫嚣起来：“文人从来就是反现状的！”于是锋芒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揭露阴暗面”的作品突然多了起来。

这里，我想举出比较有影响的两位人物。一位是冯雪峰，另一位是徐懋庸。

冯雪峰在去年编辑会议上，以十分阴暗的口吻号召作家去表现“人民的痛苦”：

文学作品应该歌颂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鼓舞人们前进，但不能说今天人民就没有痛苦，问题在于怎样了解痛苦，在于作家本身的感情。

.....

我们同志怕尖锐地提出问题，而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作家与人民生活隔离，人民的痛苦在作家那里得不到反映，有时能反映一些，也是盲目的。

徐懋庸则号召要“不怕黑暗”，争取“民主”，把“官僚主义者”当敌人一样进行打击，直到他们“消亡”为止：

但官僚主义者既然还有，那么，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动放手，才敢充分享受民主。我们现在敢于充分享受民主的表现之一，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经过斗争，官僚主义恐怕是不肯自行消亡的。

.....

不怕黑暗，也不怕太阳，那么，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①

最近全国讨论毛主席讲话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看报纸上，言论一放，所有的人意见纷纷，诉不满谈顾虑，矛盾多极了，苦闷多极了；因而使得负有解决矛盾之责的人们，也“忧心如焚”，官僚主义者也不能闭目塞耳地睡懒觉了。

这是好现象，人们从此再也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了。现在的社会，已不是过去的社会，现在的人，已不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惱，决不会消极悲观，反而会生出更好的思想来，于个人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都有益。②

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阴暗面”，那这一面首先就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地富分子等等的反革命活动，以及敌视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人的暗底下的破坏活动。其次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某些人的心中还严重地盘踞着，他们阴暗的内心是社会主义阳光所照不到或照不透的。文学要帮助人民把这些“阴暗面”从生活中铲除掉，那就要以鲜明的党性去揭露社会主义敌人的丑恶的本质，揭露他们阴暗的活动同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中间必遭覆灭的

命运，批判那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官僚主义，当然也要批评，我们从来就主张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去改正工作中的缺点。但官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也并不占主要地位或统治地位，因此，不能够把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都丑化成人民的敌人，或者把官僚主义描绘成统治一切的一种力量，仿佛现在我们社会中已经被官僚主义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了。——这种歪曲的描绘正是右派分子所衷心希望的。这是“清规戒律”吗？不，这是生活的真实，在我们的如旭日方升的社会主义祖国里，官僚主义是没有合法存在的权利的，官僚主义不管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候如何厉害，它决不可能永久存在，而是被当作一种旧意识旧作风的残余，被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地克服下去。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保证着劳动人民有可能发挥最大的民主同无限的创造性，因此也就有着不断地克服官僚主义的社会条件。个别地方官僚主义者即使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最终这个错误还是得到了纠正。凡是肯睁眼看一看八年来许多事实的人，总会证明官僚主义在我们这里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克服着，党领导的整风运动的内容之一就是反对官僚主义。

然而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阴暗面”的人，却把我们社会说成似乎没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义者”争取。徐懋庸的脑子里，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种不要集中的绝对民主。“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动放手”，这“我们”和“他们”，就表示他是把自己同各级领导干部处于对立地位，同党的领导处于对立地位，同无产阶级专政处于对立地位，既

然“他们”不肯“自动放手”，那就只有“斗争”了。于是，当社会上右派疯狂进攻，“言论一放，意见纷纷”之时，徐懋庸也就挺身而出，大呼“这是好现象”，“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苦闷多极了”。怎么摆脱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社会的苦闷”呢，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来”。这“更好的思想”是什么？——恐怕每一个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都会明白的。我们在某些“揭露阴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销的“更好的思想”吗？

今天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困难、有阻碍、有艰苦的斗争，但他们的心境是豪迈的，他们在克服困难中歌唱前进，“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就是劳动人民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他们有什么“痛苦”呢？作为个别的人来说，当然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候在某个问题上有痛苦的感情，如果需要，我们在描写人物时也可以作为人物心理的一个方面；但作为人民、作为整个工人阶级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却是没有什么痛苦的。使他们痛苦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被历史埋葬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全心全意创造着集体的幸福，也创造着自己的幸福。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代人民享受着这样美好的生活。困难、牺牲、艰苦，都压不倒我们在自己的社会主义中那种乐观的、自豪的、充满胜利信心的感情。到工厂中去看看大字报吧！工人们是用多么亲切的感情歌颂着解放后生活的提高同愤斥着人民生活“痛苦”、“国富民穷”等等谬论啊！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共同的声音吗？